

第三条道路

〔捷〕奥塔·希克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第三条道路

（德）施密特·哈特曼

COLLIER
NEW YORK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第 三 条 道 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

〔捷〕奥塔·希克著

张 斌译

人 民 出 版 社

Ota Šik

DER DRITTE WEG

Die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Theorie und die

Moderne Industriegesellschaft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Hamburg 1972

本书根据西德霍夫曼—卡姆佩

出版社 1972 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第三条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

[捷]奥塔·希克著

张 斌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76,000 字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600

书号 3001·1802 定价 1.2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奥塔·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当政时期的副总理、“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之一。一九六八年苏联侵捷后，希克流亡西方，在瑞士圣加伦大学任教。

希克是位经济学家，主张对苏联式的社会模式进行改革。他说：“我决定离开故乡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进一步专心致志地从理论上加深和完善改革思想。”他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都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存在着严重的利益矛盾，即：所有者和无产者、官僚主义管理和生产性劳动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全面地设计一个民主和人道社会的模式”，“取代今日的共产主义体制”，“克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消极方面”。基于这一思想，希克在流亡西方后陆续发表了《第三条道路》和《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据》等几部著作。《第三条道路》一书于一九七二年在西德出版后，受到国际思想界和舆论界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些争论。

现将该书全文翻译出版，供理论和经济研究工作者参考。书中的注释均系作者原注。

一九八一年八月

序 言

这本书是我多年来理论变化的一个梗概。这里，我谨想用几句必要的引言来说明这一变化过程，说明我在本书中所陈述的观点是怎样形成的。我的这一发展已招来某些方面的强烈指责。一部分人认为我的思想变化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另一部分人则因为我没有宣布赞成资本主义而不快。从理论上说，我既不是背叛共产主义，也不是赞扬资本主义。

在对立的双方，各有一股保守力量。他们由于同这种或那种制度有着一些涉及个人的联系，从而不可能很好认识各自制度中所存在的冲突和发展障碍。不管是由于经济特权还是由于引人注目的权力地位，不管是在今日的西方还是在“社会主义的”东方，那些追求实利的保守主义者们唱的都是一个调子：“一切制度改革，对我们来说，对社会成员来说，都是一种危险。”

我认为，社会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不断取得的经验，以及多年来的观察和持续不断的研究，使我认识到我们社会的根本矛盾。我将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

在我年青的时候，我认为社会的贫困、人民的痛苦、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煽动是太严重了，因此我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促使我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也是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革命运动，但是在革命之后，人民依然无权，这一现实又终于使我不得不离开共产党的掌权者，并同他们的意识形态辩护士展开了斗争。我认为，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决不是一种信仰教条，只有当它能帮助我理解社会现实，给我以方法去认识社会的弊病和问题时，它才是有效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看法却一直被执政者们视为一种邪说。

在纳粹集中营里，我看到年青时期的朋友被残酷折磨至死。鉴于这种堕落的政权体制所带来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我形成了我的生活目的。但不是复仇的思想，而是探索社会堕落实质之心，捉住了我的身心。非人道的暴行从来就不单纯是个别“领袖”的创作，它产生于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我认为，实现社会人道化的道路首先在于消灭阶级社会，在于把劳动人民从经济剥削和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在于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化。当时我认为，党就是这样一些人的联合组织，他们一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错觉。

五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公开审讯”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那些最忠于共产主义的人被逮捕，恐怖席卷全国，“自我批评”、告密和特务活动毒化了整个气氛。甚至反犹太的倾向也得到领导人的怂恿，它与当年的法西斯煽动几乎没有差别。当年党的总书记和其他一些人被迫在法庭上供认：“我，鲁道夫·斯兰斯基，犹太血统……。”谁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谁就被碾得粉碎。

从那以后，劳动人民开始回避共产党干部，避免与他们接近。普通党员的政治热情日益消失，代替它的是党的机关所组织的活动。斯大林逝世后，第一批公审的牺牲者被悄悄释放了。过去有关迫害和逼供的传说得到了完全证实。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政权的罪恶性质和它所采用的大规模恐怖活动的方法。它同法西斯的原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对匈牙利人民起义的血腥镇压，以及把它解释为帝国主义煽动的结果，不仅使我感到可笑，而且也表明新帝国主义的肆无忌惮。

我日益怀疑理应走向人道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是否正确，我逐渐认识到这一制度的非人道性，并最终对它失去了信仰。赫鲁晓夫的演说使我大为震惊。它使我感到，我过去的政治活动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我也不同意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成是万恶之源，那是一种幼稚的解释。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离开党的队伍；要么通过长期的、耐心的和目标明确的活动为改变这一制度作出贡献。我和一些最亲近的、抱有同样观点的朋友决定走后一条路。

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我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和道路。当初，只有我最亲近的朋友对此略有所知。当然，要从曾经坚信过、并为之传播的教条下逐步解放出来，这对我说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但我不是孤立的，这一点在争取真理的斗争中甚为重要。我同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起日益公开和目标坚定地根本改变这一制度而努力。这一运动的基础逐渐扩大，它震动了官僚当局，它也使人民日益接近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一次战役失败后，“聪明人”总是会说，当时应如何如何。他们不去研究当时改革运动的具体发展条件，他们忘了经验只有在事后才能总结，忘了吃一堑、长一智这一简单的道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虽然被暴力镇压下去了，但它完成了一项使命。它说明：发展的可能性是有的；摆脱共产党暴政而又不到资本主义旧制度的道路是存在的。这一认识既然已在东方各国人民中产生，它就不会从人们的脑海中抹去。思想在发展，有朝一日，条件变得更有利时，它将变为现实。

我决定离开故乡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进一步专心致志地从理论上加深和完善改革思想。这关系到全面设计一个将来能取代今日共产主义体制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模式，一个将克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中基本消极面的模式。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主

义体制的原则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有所阐述，但我请读者们不要在本书中寻找详细的模式设想。按说，一个真正的作为新出路模式设想，只有在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在观察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的过程中才能自然形成。

我也不认为，人们能够设想出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理想社会形式。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只能固守现存的制度。许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至今仍停留在“不是这，就是那”的方法论水平上，即：拒绝别的制度，就意味着无条件地承认本制度。我认为，看到和批评一个社会制度的发展矛盾并不意味着忽视和简单地否认另一个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冲突。两种制度的根本性缺点都必须克服，但是，只有当人们经过分析，认清了某些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也已成熟到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加以克服时，人们提出的有关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建议才是可行的。此外，克服的方式也应真正符合当代发展阶段上的人的本性。我关心的就是这样的分析，以及有关改革设想的制定。

但是，在我能够提出新社会模式的基本原则之前，我必须先分析现存的共产主义制度，指出这个制度所包含的病症。在许多文章中，我已指出：这不是一种幼稚病，而是一种瘟疫；只要这个制度的基本原则思想不改变，这个病是无法医治的。今天，这种制度的执政者们竭力否认这一点，这也不是为奇。但从长远看，科学的认识一定比最重大的权势利益更加有力。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人们总不得不以耐心来对付残酷的暴力。

分析共产主义制度这项工作告诉我，人们不能忽视这个制度的理论基础。按照理论设想建立一种社会形式（包括它的经济制度），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现在，这个制度的根本缺点已经暴露出来了，它的根源必然存在于它的理论之中。本书首先就是试图彻底分析作为共产主义实践基础的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我希望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尽可能的客观，我不仅要用地后来的实践经验，而且也借助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的、首先是经济学家的知识来对这一理论进行评论。我认为，把一切缺点和错误都写在斯大林的帐上，而同时发誓效忠列宁，或者，承认列宁也有某些错误，而宣称马克思是不可侵犯的，这都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也拒绝这样做。对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检验不应受事先确定的政治意向和某种思想意识上的利益所束缚、所干扰。客观真理是有的，它就是客观现实在人们思想上的正确反映，科学的任务就是不带成见地尽可能接近它。虽然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只是相对的认识，但我们可以通过持续地正视现实，通过不断克服那些为狭隘利益服务的教条，逐步接近客观真理。

包罗万象的、永远正确的社会理论是没有的。认为某一理论符合进步阶级的利益，因此就说它是正确的，这只是一种借口。实际上，在这种论调的背后隐藏着非常狭隘的权势利益。只有首先对一定的社会利益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发现这些利益的真正内容以及它们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社会本身，以及各种利益和理论认识都是发展的。有些理论在一定时期内是正确的，并符合进步的社会集团的利益，但这些理论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也可能僵化成不充分的、片面的或错误的理论。同样，进步的社会集团本身也可能转变为保守利益的代表。只有持续不断地以改变了的社会客观现实来检验各种理论，不断在发展中分析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才能使科学的社会认识得以丰富，才能使它保持准确性和富有生气。卡尔·马克思的认识在当时是非常卓越的，但这些认识也具有时代和人的局限性。把它说成是永远有效和不可改变的理论，就会使它变成思想教条，使它脱离科学。

许多西方社会理论家只字不提马克思，并把他的理论贬低为微不足道，这同样是不科学的，是脱离实际的。不管它是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还是由于对马克思著作的完全无知，这种非科学地拒绝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态度都只能有损于社会。即使某些理论家和教育家由于对近代出现的纯教条的共产党宣传感到厌恶，从而拒绝谈论马克思的理论，但这种态度也只能有利于政治煽动者。

无可争辩，马克思是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他同所有其他科学家一样（除了某些错误和过时的结论外）给人类带来了至今还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知识。因此，在西方许多大学里不提马克思或歪曲他的思想，这只能有利于政治煽动者。特别是一些反对旧社会制度的青年，一旦发现马克思，发现马克思的许多无法估量的思想时，他们原来置之不理的态度就会在一定的政治影响下变成一种感情冲动，他们就会片面地过高估计这些思想，并简单加以接受。就这一意义而言，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包括那些从事辩护的机构所造成的结果正好与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所要追求的目的相反。

只有客观地评价马克思的理论，承认所有仍符合当代社会现实的见解，并同时指出它的简单化、片面性和错误，这样才能防止对马克思理论作非科学的美化。人们应当按其真面目来承认马克思，即：他是一位伟大的、对深刻认识人类社会作出了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西方的理论家，首先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否认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思想，这对发挥这些理论的作用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很少有一门科学象经济学这样被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两种经济科学虽然研究的是同一对象，但方法、思路和范畴截然不同。这说明，不是由于基本认识不同，而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成见在这两种经济学之间造成了鸿沟。一方，基本上否认马克思提出的各种范畴，另一方则仅仅承认来自马克思理论的各个范畴。

双方的保守派思想家对此状况感到舒适，并首先迫害那些试图跨越这一鸿沟的理论家。如同两方面的保守派政治家一样，保守派思想家首先关心的是保住他们的王国。一部分人为了保住他们的精神王国，另一部分人则为了保住他们的物质和政治王国。尽管两种对立体系之间相互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只要不触动本王国的地位，双方的代表人物都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予以容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保守派思想家相互都很谅解，并都特别咒骂一切改革家和一切趋同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将埋葬他们的权力地位，它比那些已可靠地加以镇压和抵制的老敌对观点更危险。

如果说在社会科学中，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最不相同的观点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桥梁，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双方，已有越来越多的独立思想家，他们不愿再受狂热思想的驱使走向世界对抗，他们对此已感到厌倦。双方都有部分真理，同样也都有错误、简单化和无价值的教条。在当今这个被分割的世界上只有大国的利益得到贯彻，小国的利益被违背和忽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与政权相一致的思想才得以传播，而这些思想则不断在亿万人民中造成某些人所希望的敌对心理。谁不愿安于这种分裂的世界状况，谁不愿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苟且偷安，谁相信我们的社会将有一个人道化的未来，谁对这种核威胁的“现实”不满，谁拒绝这一切，他就必须首先为存在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理论鸿沟寻找架设桥梁的道路。自古以来，新的实验只能来源于新的思想。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为两方对抗的世界决不会带来持久的现实的和平。

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说“反共产主义”就一定是“亲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臆造出“反共”这个词，并把它当作一种吓走麻雀的草人，为的是使那些思想进步和

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去重视那些对这个非人道的制度所提出的原则性批评。但这种宣传依靠的只是宣传机器的大量的和大声的喧嚷，它缺少充足的论证。从进步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否认共产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企业的国家所有制，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等等），这同保守的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反共”是不同的。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人道思想没有共同之处。它令人难以置信地玷污了这种人道的社会设想。它与今日的资本主义相比，并不见得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即使那些至今还对共产党国家抱有幻想的西方青年也迟早会看到这种国家的反社会主义性质。

共产党国家的执政者们在言行之间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以致它的表现不仅已为人们所看到，而且已深深印入老百姓的脑海之中。谁若真正为劳动人民的命运着想，真正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异化，他早晚将不得不抛弃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践。当然，在这方面诚实是决定性的。只有那些只顾追求个人前程、权势和地位的人才会感到这种集权主义的制度可以使他们达到目的。

但是，构成人们思想觉悟的不是官方宣传的那一套，而是广大居民的亲身经验。总有一天，这些经验将决定国家官僚暴政的命运。历史就是如此。思想煽动和欺骗再多，也不能改变这一进程。

但是，这些经验必须通过进步的社会理论加以补充。劳动人民只知道，什么是他们所不愿意要的。没有理论，他们就不能提出新的目标，而社会科学的责任就在于此。社会科学要从事的不是提出新的幻想，而是对现实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分析，找出它们存在于制度中的根源，指出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人道的责任。

人民的经验与进步社会理论相结合，将战胜权势利益。我希望这部著作能对此有所贡献。

奥塔·希克

一九七二年九月

于瑞士，巴塞尔—圣加仑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是合乎规律的必然性	(1)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1)
经济推动力	(1)
生产力的发展	(6)
历史的抽象	(10)
简单化的运用	(14)
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	(19)
二、经济变化和利益	(23)
利益问题的重要性	(23)
经济利益的实质	(30)
经济活动	(32)
经济利益的划分	(38)
经济和非经济利益	(43)
利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49)
利益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反映	(51)
社会主义兴趣的演变	(63)
三、异化理论和官方对它的忽视	(70)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70)
马克思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74)

阿隆的错误解释	(76)
异化概念与剥削	(79)
市场关系与异化	(82)
各种异化过程的内在联系	(87)
第二章 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市场理论	(93)
一、早期资本主义和价值论	(93)
(1) 经济分析的目的	(93)
价值论	(95)
(1) 价格运动	(100)
(1) 剩余价值论	(104)
(1) 生产价格论	(106)
二、垄断制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价格论	(112)
(01) 非马克思主义的价格论基础	(112)
(41) 边际效用论	(113)
(01) 生产费用	(115)
(33) 垄断的含义	(118)
(32) 垄断制度下的价格发展	(121)
(03) 长远的利润均衡趋势	(124)
(33) 等价交换和供求律	(126)
三、马克思从价值论和价格论中得出的结论	(128)
(24) 生产价格的强调	(128)
(04) 劳动等价交换的根源	(129)
(13) 商品关系的废除	(131)
四、市场作用及其局限性	(134)
(07) 加耳布雷思的方法论	(134)
(07) 由客观决定的市场活动	(137)
(17) 利润的最佳化	(141)